

第五章

初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进入闽西苏区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我和李卓然同志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临行前，军委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用密写药水在一条手帕上为我们写了介绍信，由卓然同志带在身上。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十分猖狂，党在白区的组织不少遭到破坏，我们的一举一动必须十分谨慎。离开上海时，我化妆成商人，李卓然同志化妆成教师，经过数十个小时的海上生活，来到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租界地，虽然也危险，但由于它的自由港的地位，过往的各国人众多，客观上比较好隐蔽。我俩与交通员接上头，住在一家旅馆里，等待组织上安排去汕头。

一天，我俩在街上走，看到一个小书摊上摆着一本翻译成中文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就买了下来。因为我们从苏联回国的时候，为了躲避层层哨卡，基本上什么书都没有带回来。看到合适的书，就想买一点，准备日后工作之用。

不料在过卡子时，不知为什么，英国巡捕把我们扣下了。当时这本书还在我手中拿着，扮作教师的李卓然同志马上很机警地把它拿了过去。因为我是扮做商人的，这本书我拿着显然不合适。过了一会，巡捕来搜查我们。先搜了我的身，什么也没有搜到，接着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大米生意的。在搜查我的时候，我看到李卓然同志从容不迫地拿出那条写有介绍信的白手帕，使劲擤了一下鼻涕。卓然同志有鼻窦炎，这件事办得既自然又贴切。当英国巡捕搜他的身时，看到这个沾着鼻涕的脏手帕，厌恶地把它扔在地上，结果自然也是什么也没接出来，就挥手让我们走。这时，卓然同志很坦然自若地把手帕拣起来放进口袋里走了。李卓然同志表现得是那樣的机警、富有白区工作经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遇险以后，我们的行动更加谨慎了。过了几天，党的交通员送我们从香港到了汕头，沿党的地下秘密交通线，经大埔进入闽西苏区。我留在了闽西，李卓然同志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奔赴赣南中央苏区。

闽西根据地是一九二八年张鼎丞、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领导闽西人民进行武装暴动后创立的。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党长期领导闽西革命斗争，群众基础较好。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四军进入闽西，打土豪，介田地，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三〇年六月，

以这两个根据地为基础的中央根据地基本形成，但两块根据地还没连成一片。也就在这时，立三路线统治了全党。由于立三路线的总方针是“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定以武汉为中心举行武装暴动，调动全国主力红军包括闽西的红十二军离开苏区去攻打长沙。与此同时，闽两也贯彻了立三路线，集中刚刚成立的红二十一军向广东出击，企图以广州为中心，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结果红二十一军两次出击东江都遭到了失败。

我来到闽西苏区是一九三〇年底，正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的时候。当时闽西的形势并不好。红二十一军出击东江失败以后，又在龙岩等地受挫，部队遭到损失，兵力只有两个团，共千余人，士气不高。闽西苏区的群众由于我军事上的失利，情绪也受到影响，地方武装力量也很薄弱。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闽西苏区南线的军阀部队张贞的一个师，向苏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撤出了苏区的首府龙岩城和永定，接着敌人又进占了龙门、白土、坎市等地。在苏区北线，有土匪芦新铭、芦兴邦部盘据在汀洲、连城一线，西线上杭一带有败钟绍奎部千余人，东面上杭以北四、五区为当时视为敌人的傅柏翠割据，形成了对闽西苏区四面包围的态势。敌小股匪徒经常潜入苏区内地进行破坏活动，群众中有风声鹤唳之势，部队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形势很紧张。

一九三〇年底，中央派邓发同志来闽西，在坑口省委

所在地召开党代表会议，传达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的决议。我到坑口的时候，会议正在进行，我没有参加此会议。会后即成立了闽粤赣省委和闽粤赣军事委员会，邓发同志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我任参谋长。接着，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红二十一军改编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黄甦任政治委员。省委和军事委员会机关遂移至永定的虎岗。

闽西苏区是我一九三〇年回国后第一次在红军中工作接受战斗洗礼的地方，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我开始了自己独立指挥部队作战的初次实践。从个人主观上来说，是一心一意努力工作，热情很高，干劲很大，想把自己在苏联学习的军事知识用于红军建设的实际。记得当时自己看到部队的素质较差，军事技术水平很低，便开办教导队，亲任教官，训练干部。不久，组织上又确定我兼任闽西彭扬军事学校的校长。我们将部队中表现较好，作战勇敢，有发展前途的同志选拔到军校进行速成学习，学习基本的战术技术，学习带兵的方法，进行实战军事演习，为部队培养一批连、排干部。那时候办学虽然很简单，学习周期也很短，三、两个月，顶多五个月，但要求很严。我那时从苏联刚回来，决心按正规的方法训练部队。要求军容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学员、教职员一律穿细布列宁装。我学习苏联的被装样子，为部队设计了红领章，用两块小红布缀在衣领上，先在学校中实行，后来推广到

部队中去。在中央苏区二、三次反围剿期间，闽西也不断有大大小小的战事，所以，学校也经常配合战斗，不能在一个地方进行单纯的学习、训练。因此，我们的训练方法是结合实战进行学习训练，每一仗打下来就总结经验，进行再学习，这样使学员在短时期内有较大的提高。

一九三一年春夏之际，王稼祥、任弼时和顾作霖同志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从上海来中央苏区，路经闽西去瑞金。他们来到闽西，恰逢我正在指挥部队进行保卫虎岗的军事演习。王稼祥同志不顾疲劳一定要跟我一起去看部队演习。这是我初次结识王稼祥同志。我们两人一起站在一个小山头上，他一面看演习，一面不时地向我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军队的来源，成分问题，作战能力问题，部队党的建设和作用问题，军民关系问题等等。也许是因为他长期在国外，又刚从白区到苏区来，样样都感到新鲜的缘故，问得很详细，听得也很认真，一副虚心好学的样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在国外学到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同志，这种善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特别重要。稼祥同志在苏联一直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没有学习过军事。以后他在中央苏区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干得很出色。这固然与他较深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实践中实事求是，逐渐抛弃教条主义，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服从真理，坚持真理的结果。我们这些从

国外回到国内进行革命实践的同志，都面临一个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摒弃教条主义的问题。在闽西工作的这一年，自己对这点有了初步体会，回想起来，经验教训不少。刚从苏联回来，初出茅庐，不懂国情，也不懂红军作战的特点。北伐时，打的是正规战，在苏联学的也主要是正规战，对于在中国这一特定条件下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不懂得，也没有虚心向坚持苏区斗争的老同志请教，单凭主观指导作战，因而有的仗打胜了，有的则打败了，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闽西军事斗争的回顾

我在闽西短短的一年中，主要是做军事工作，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如前所述，从一九三〇年七月起，由于贯彻立三路线，为实现闽粤桂三省暴动的目标，闽西主力红军出击东江连遭失败，部队遭到损失，根据地被迫缩小，我到闽西时正面临着这一严重形势。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的坑口会议，目的是开展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张鼎丞同志所说“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性质及其所造成的恶果，并未清算，对于闽西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政策，也未具体地研究和转变”。坑口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方针仍然是“巩固闽西苏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的方

针。这一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在后来也并没有具体实行，因为它脱离实际，根本行不通。第一，广东东江苏区根据地当时已经失败了，剩下几百人的游击队，退往了南山，在这种情况下，仍提出“与东江苏区打成一片”的方针显然是不现实的；第二，蒋介石已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敌我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敌人在我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后，由防御转入进攻，进攻的主要目标是朱、毛红军，闽西也当然包括在内。因此我们在战略方针上不能离开配合朱、毛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整个形势，而孤立地向东江冒进；第三，从敌我力量的对比上看，以我们千余兵力去进攻张贞的一个师和其他广东军阀、团匪，显然是力不从心，陷于军事上的盲动主义，前二次打东江已是明证。由此可见，虽然经过坑口会议，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这一错误的指导方针虽未执行，但给部队作战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带来很大影响，陷于被动应付的局西。这一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一直持续到一九三一年三月的虎岗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一时期，我对苏区的军事工作尚处于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熟悉情况的阶段，率领部队打了一些小规模防御战。对于再次打东江，我是表示反对的，因为事实很明显，从最简单的军事常识来说，拿一支仅千人的部队去与敌一个师作战，无疑是愚蠢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了

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一月份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虎岗会议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名义上继续反立三路线，实际上接受了比立三路线更左的王明路线。在地方上，提出了以深入土地革命为中心，实行查田查阶级的过“左”政策。与此同时，在党政军中开展“肃反”，又提出以肃反为中心。这两个“中心”，实际上都是推行王明路线的重要内容。为了保证肃反、查田查阶级工作，在军事上提出了一个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的战略方针——“保卫龙岗、虎岗”。

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我们将闽西红军主力新十二军从北线南调到龙岩、永定一带进行敌后游击战，以求向金峰一带打开一个出口，牵制敌人，达到保卫龙岗、虎岗的目的。十二军南调以后，即攻打坎市，结果攻坚未果，部队反受挫。后来又指挥部队去打大、小池，同样是硬拼仗、消耗仗，城池未打下来，部队又遭损失。确定这一作战方向，主要是认为龙岩、永定是闽西苏区的基地，要巩固苏区就必须巩固龙岗、虎岗。而虎岗是省委机关所在地又在苏区南部边缘区，距敌占领的坎市只有三十里。这一作战方针的确定，实际上拴住了部队的手脚，使部队不敢远离苏区去放手打仗，发展苏区，形成了保守主义和单纯防御的作战。攻打坎市失败以后，又将十二军调回虎岗集中肃反。当时“以肃反为中心”，一方面需要部队作后盾，另一方面而又搞得风声鹤唳，到处都是“社会民主党”，对部队本

身也不信任，更不敢让部队远离苏区。结果，连以保卫龙岗、虎岗为目的的深入敌后打游击，牵制敌人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使部队始终处于被动应付、单纯防御的地位。后来，为了防止钟绍奎、傅柏翠部队腰断苏区的企图，又调十二军去消灭傅柏翠。这一行动不仅扑了空，反因给养困难造成部队与群众的对立情绪。随后，部队又展开于上杭、武平方向，准备打击钟绍奎的进犯。这一军事指导方针持续了三四个月，直到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时才停止。

在这期间，我指挥部队打了不少仗，虽然有些仗也打胜了，但苏区不但没有巩固，反而日益缩小；红军不但不能扩大，反而削弱了，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保守主义的“保卫龙岗、虎岗”方针指导下，开始，我们在战略上采取的是单纯防御的方针，在敌人的“围剿”面前，把主力部队拉来拉去，处处招架，大门不出，后门也不去，自己把自己束缚在家里，反而让敌入到我们苏区内部打游击，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在战术上也是只注意攻打据点，打正规战。如两次打大、小池，打坎市，都是硬拼，结果伤亡、消耗都很大。这些军事工作上的失误，我作为指挥员都是有责任的。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但缺乏实践经验，没有太多的军事指挥艺术。挫折和失败教育了我，使我逐渐体会到在红军弱小和根据地不稳定的情况下打仗，更多地需要的是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与敌入盲目硬拼的阵地战，攻坚战。残酷的斗争迫使我去学

习，去思索，去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第三次反“围剿”时，我们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向北发展”的军事战略方针。从当时闽西所处的具体情况看，南线敌人的实力最强；向西则有汀江等河流阻隔，不便发展；向北敌人仅为地方团匪，力量薄弱，而且地域广大，粮食充足，群众条件好，可以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因此决定了主力部队向北发展，以求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苏区，扩大红军。南线留一部分部队打游击，牵制广东的军阀部队，掩护主力向北发展。具体计划是：（1）先打下上杭、永定之间的芦丰、丰稔两据点，巩固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的联络线，然后主力向汀洲、连城方向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2）在南线组织工作委员会，以罗明同志为书记，除地方武装外留下主力红军的三分之一。（3）省委北移，第一步移向白沙。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具体计划的实行也比较顺利。

为了实施“向北发展”的方针，我们决定先调十二军一部南下与虎岗警卫营、彭杨学校的学员一起攻打芦丰。芦丰当时为地方团匪钟绍奎部盘据，在这一军事行动开始前不久，伍修权同志从苏联回国来到闽西，分配在闽粤赣军区工作。那时他年轻有为，军事知识丰富，我们一起研究制定了攻打芦丰的计划。在等待十二军到来的时候，发

现敌人有增兵芦丰的企图。我们当即决定在敌援兵到来之前，先以虎岗警卫营和彭杨军校的学员共四百余人投入战斗，一举攻占了芦丰。下午敌人援兵赶到，与我争夺激烈，我军即撤往蓝家渡集结。在战斗中，伍修权同志不幸负伤，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次日，十二军赶到。钟绍奎及邱伯琴等匪部集中千余人袭击蓝家渡，激战一天，将敌击溃。钟绍奎被赶回河西上杭，邱伯琴也逃出了苏区。接着，我集中兵力进攻丰稔，敌人闻风而逃。部队在丰稔休整数日，将虎岗警卫营编入十二军。这时，虎岗已被敌人占领，省委领导同志张鼎丞、罗明、芦德光等集聚于丰稔，决定主力北上，芦德光随军行动，罗明率十二军的一个团及地方武装留下，负责南线工作。省委机关移驻白沙。我到白沙时，敌情紧张，省委机关继续北移徐坊。敌张贞、区寿年及钟绍奎等六个团的兵力从龙岩、上杭、永定方向向苏区进攻，白沙被占领。我指挥十二军其他部队及彭杨学校的学员（总共约八百余人）向汀洲、连城方向发展，到达汀洲附近。钟屋村一仗，击溃了敌人的主力卢兴邦、易启文等部，随即乘势夺取汀洲城，接着又攻占了连城。这几仗打得十分干净利索，部队士气越来越高，仗越打越好。此时，中央苏区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攻占了瑞金。中央红军第十二军在罗炳辉、谭震林同志率领下，到达汀洲，至此，中央苏区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这大约是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在红军节节胜利的威慑下，南线敌张

贞被迫退守龙岩、永定一线，被敌人占领的上杭、永定大部分苏区又夺回我们手中。新老十二军在汀洲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第十二军。由罗炳辉同志任军长，谭震林同志任政委，谭政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

这一阶段的军事工作的战略方针，是符合闽西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也是符合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指导思想的。我正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懂得了这个道理，逐步走上了这条正确的道路。然而，在当时以至在后来批判罗明路线的时候，有的中央领导同志指责我们“向北发展”是错误的，是“逃跑主义路线”，这显然是错误的。闽西苏区是上海党中央进入中央根据地必经之路，从一九三一年起，由于立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一九三三年，党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这期间，党中央不断从上海派人路经这里，宣传、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闽西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按照“左”倾的理论，闽西的发展方向应是继续不断地向南，以促成闽粤桂三省总暴动的形势，那就不叫逃跑主义。闽西从一九三〇年七月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那是一条失敌主义的路线。如果说，“向北发展”的方针能及早定下，对尽快结束立三路线的错误，巩固和发展闽西根据地，壮大红军力量，收效将更大。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执行这一方针中没有缺点错误。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在主力向北

发展时，有目的的在南线组织两个支队，一支向龙岩，一支向闽粤边开展游击战争，就可以既巩固老区，又发展新区，收获会更大一些。

关于闽西肃反问题

闽西肃反是从一九三〇年底开始的，那时我刚到闽西。当时以林一株为主席的肃反委员会已经成立，第一批被捕的是原红十二军的一个团政委林海汀等人。三月份，这批人在虎岗被公审后枪杀了。

闽两肃反从军队开始，是与闽西当时的形势分不开的。自从执行立三路线打东江以后，敌人步步紧逼，深入苏区活动，根据地逐渐缩小，我们队伍中有些政治不坚定分子投向了敌人，苏区内部也确有配合敌人进攻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由于连连失敌，军队中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和对领导的不满情绪，说怪话的人不少，逃跑的也有。当时的领导者没有从立三路线“左”的错误中找原因，进行正面教育，却把这些现象视为反革命活动，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严重扩大化。加上当时所谓的“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傅柏翠过去也是闽西红军西纵队的司令员，改编成二十一军后仍担任司令员职务，因而认为军队的问题严重，不断地从军队中抓“社会民主党”分子。对于傅柏翠的问题，我并不了解。我到闽西时，傅柏翠已经率一部分部队

跑到上杭以北的四、五区的山区中割据，与苏维埃政府分庭抗礼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清楚。当时在我们党内、军内，始终是把傅柏翠当作“社会民主党”的“头子”，当作敌人来对待的。

虎岗会议以后，一九三一年四月，苏区中央局根据闽西的报告，对闽西肃反工作做了“左”的指示，要求对“社会民主党”采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同时要求在肃反中反对右倾。这样，闽西肃反一跃而为当时的“中心工作”，十二军也从前线调回虎岗集中进行肃反。与肃反同时进行的查田查阶级工作，执行中也出现一些“左”的偏向，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不满甚至对抗行为。这些也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活动，于是地方上也开始了肃反。一时间，好象遍地都是“社会民主党”分子。部队中不少官兵被肃去，人人胆战心惊，造成严重的恐怖现象。担任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林一株，是个品质很坏的人，地主出身，心狠手毒。在肃反过程中，他既不重证据，又不重调查研究，轻信口供，甚至进行逼供、指供，扑风捉影地抓人、杀人，造成严重的恶果。

对于这种肃反，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是路线错误，认为有反革命当然应当肃清。所以，肃反委员会拿来名单，从军队中捉人、让军队去捉人，我也执行了。后来，随着肃反的面越来越大，打击、杀害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之间也不团结，互相猜疑，自己便逐渐产生了疑问，哪有这样多

的“社会民主党”啊？对林一株搞的那一套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很看不惯，便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记得有一次，在行军的路上，偶遇彭杨学校的一个学员在领导面前哭辩，一问，才知他不慎把套筒枪搞坏了，领导硬说他是故意破坏武器，是“社会民主党”分子，要处分他。这简直是乱弹琴，这样一点小错就冠之以“社会民主党”分子，可见肃反搞得之荒谬。我批评了那个干部，同时教育战士，今后要爱惜武器，了结了这件事。在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就是同情“社会民主党”，就可能被立即打入另册，甚至遭杀身之祸。只能在自己工作职权范围内，对这些“左”的做法作一些抵制。后来，听说张鼎丞、郭滴人同志都有了问题，大家人人自危，不敢往来。不久，我也莫名其妙地有了“问题”。有一段时间，林一株用肃反委员会的名义派了一个大肚子女人来守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电话是安在我房间的门角边，那个女人就跟我坐在一个房间里守着。我觉得太不象样子，只好把电话移到门外边去，请那女人到外边去坐着。有一天，省委领导芦德光来我处，看见了这个女人，就问我她是干什么的。我很奇怪，我想派这样一个女人来我这里做这种监视工作，总是经过省委同意的，谁知省委竟不知道。可见当时肃反委员会的权力之大，而且对什么人都不相信了，党内政治生活已到了极不正常的地步。以后，没有任何交待又把这女人调走了，其中究竟有什么鬼也不知。总之，

大家都互相猜疑，也互不敢随便问个究竟。肃反搞到最后，林一株自己也被捕了。听说他承认了与傅柏翠有关系，也不知是真是假。

肃反使闽西的党组织、军队和人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灾难。今天看来，这场灾难完全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恶果。本来，立三路线造成闽西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对这些同志应当与真正的反革命区别对待。真正的反革命是应当肃的，但不应当混淆了敌我界限。当时“左”的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错误地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并且逐步升级，越来越扩大化，当时在闽西处于主要领导地位的是外来的干部，有些同志不懂得闽西的历史，没有深入地调查研究，又不肯虚心地向当地干部学习，钦差大臣作风，以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处理问题，这一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当时的错误路线相结合，便造成了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同时，用了象林一株这样品德不好的人做肃反工作，也是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原因。

肃反给闽西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虎岗会议以后的部一段军事工作遭到的严重挫折，是与当时肃反为中心的错误的分不开的。当时既不信任军队，又不能不依靠军队。为了保证肃反这个中心任务的实行，把主力部队拴在家里，保卫龙岗、虎岗，便部队陷于被动。肃反中，军队里大批革命同志被错杀，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肃反引起领

导之间的不团结，同志之间互相猜疑，党群之间隔阂日深。在敌人大举进行反革命“围剿”之时，我们的同志不是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却在自已内部杀了大批好同志，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主观主义，“左”的路线害死人啊！

离开闽西到瑞金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形势很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我与张鼎丞、郭滴人、邓发等同志作为闽西根据地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次空前的盛会，各根据地的代表云集瑞金，有九百人之多。我回国后第一次到瑞金，碰到许多过去在一起工作的战友、同志和上级领导，象毛泽东、何叔衡、王稼祥、瞿秋白、任弼时、刘伯坚等同志，久别重逢，格外亲热。会上讨论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等文件，通过了决议。我记得还让我起草了一个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提交会议进行讨论。在讨论这个决议案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参加了，还有一些军队的领导同志。我那时年轻，又从苏联刚回来，讲了许多苏联红军的情况如何如何，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建设提出许多意

见，发言的时候嗓门很大，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喝口水，坐下慢慢地讲。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尽管毛泽东同志没有批评我，但我意识到自己不够谦虚。自己虽然在苏联学习过，掌握一些理论知识，但缺少实践经验，有些意见并不一定适合国情。这个决议大家讨论得很热烈，记得中间休息时，彭德怀还在与林彪争论不休。可惜时间太久了，讨论的具体情况回忆不起来。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被选为政府主席。

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告诉我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培养一批红军干部，中央根据地准备办一所红军学校，已经派一批同志去做筹建工作了。考虑到我学的军事知识比较系统，组织上准备派我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那时候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价钱可讲，让干什么工作就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做好它。会议结束以后，正式任命我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从此，我就离开了闽西，到“红校”去就职了。

我到学校的时候，是周以栗、邓萍等同志在那里筹建这所学校，周以栗同志负主要责任。我去以后，周以栗同志向我交待了工作，便调到临时中央政府去工作。当时，学校已经有了一个架子，分三个大队，大队长分别是要裕、彭绍辉和龙云。邓萍同志任教育长，杨至诚同志任校备部

长。还调了一批教员，有沙可夫、左权、郭化若、陈伯钧、吴亮平、张如心、黄火青、伍修权、李伯钊、危拱之，还有后来在延安鲁艺演的《阿Q正传》中扮演阿Q的赵品三。大部分同志都是学有所长，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各显神通。学员大都是从在职干部中抽调来的，政治素质好，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学习热情都很高。

我在“红校”任职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一万七千人举行了起义。宁都起义在当时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分化了敌人的营垒，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热情。同时一万七千多人，两万余支枪，在当时的红色根据地内是一支了不起的武装力量，整个苏区军民都为之振奋。然而要教育改造好，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支部队如果改造得好，将是保卫根据地的一支红色劲旅，如果改造得不好，也将给苏区带来根大的麻烦。为了教育改造好这支部队，军委首先选派大批政治工作人员去工作。这支部队的上级军官多数是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比较看重学历、资格。所以从有利于党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做上层军官的工作，有利于部队的改造出发，军委在选派干部时注意选一些有部队工作经验，特别是有些改造旧军队工作经验和出国留过学的同志去任各级政治委员。十

二月十八日，军委任命我为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军团政治部主任。先后被任命为军、师、团政治委员的，我记得还有旷朱权、左权、黄火青、何长工、朱良才、程子华、朱瑞、高自立、李翔吾、唐天际、宋任穷、赖传珠、慕容楚强、刘型等同志。

不久，我就离开了红军学校，校长工作由叶剑英同志接任。我便开始了在红五军团的一段难忘的生活。